



2023 年 7 月 19 日，美空軍第 509 轟炸機聯隊 B-2 幽靈轟炸機自阿拉斯加艾爾蒙多夫·理查森聯合基地(Joint Base Elmendorf-Richardson)起飛，執行轟炸機彈性戰鬥部署演習。

(Source: USAF/Patrick Sullivan)

●作者/Kayse Jansen ●譯者/黃文啟 ●審者/黃坤銘

美國全新戰略嚇阻架構

New Strategic Deterrence Frameworks for Modern-Day Challenges

取材/2024 年第一季美國聯合部隊季刊(*Joint Force Quarterly*, 1st Quarter/2024)

※當前，多個戰略競爭對手環伺，美國必須針對全新威脅環境妥擬戰略嚇阻架構，方能確保未來全球安全與國家利益。

再一次，美國又必須面對與另一個戰略對手發生衝突的可能性。事實上，美國必須思考與多個戰略競爭對手發生衝突的潛在可能，而這些對手都日益依賴核武達成國家目標。長期以來，俄羅斯自恃國內核武庫存、中共大幅擴充核武，這也意謂，美國很快就必須面對歷史上前所未見的兩個核武競爭對手。北韓加速建立核武則導致安全環境變得更為複雜。更令人戒慎恐懼的是：上述三個潛在對手都致力深化國與國關係與拓展合作領域。

今日的威脅樣貌與十年前有天壤之別，這也促成美國國會兩黨齊聲支持美國重整核武戰力。未來 20 年左右，美國國防部與能源部將更新美國全部核武系統(除了刻正翻修的 B-52 轟炸機)、遂行核武指揮、管制及通信架構現代化，以及改造武器生產基礎設施等。這些舉措將可確保未來數十年部隊戰力能夠有效發揮。然而，整個體系中經常遭到忽略但卻同樣重要的面向，其實也需要受到關注與投注心力——知識資本。

過去數十年，美國與軍力劣勢對手交戰，幾乎罔顧戰略情勢升高風險，導致嚇阻手段與適時打擊當前對手所需之知識框架萎縮。使用核武途徑、同步打贏傳統戰爭與嚇阻攻擊的戰略，以及敵人一旦選擇升高戰略情勢時恢復嚇阻力量的概念等，都是美國在大國競爭日漸激烈時代的重要考量事項。因此，除了進行核武軟硬體現代化，美國亦須重振認知判斷流程。為此，國家安全團隊必須瞭解當前安全環境特質、重新審視持久嚇阻實況，以及探索因應現代挑戰所需之嚇阻架構。

前所未見的複雜安全環境

「嚇阻針對美國、盟國及夥伴國所發動的戰略攻擊」是美國國防部的優先要務。¹ 嚇阻一詞的前置形容詞卻往往造成混淆、爭辯及錯誤解讀，

因此基於本文撰寫目的，**戰略嚇阻**僅單純指的是嚇阻戰略攻擊。針對美國、盟國或夥伴國使用核子武器的行為都被視為「戰略攻擊」，但並非所有潛在戰略攻擊都涉及核武。事實上，美國政策刻意模糊構成戰略攻擊的定義。大體而言，美國無法排除各種可能性，在事情發生前，可能無法清楚界定非核武戰略攻擊。由於科技快速進步、對科技依賴程度日益增加，愈來愈多想定本質上都可能屬於戰略層次，但至今仍無法充分瞭解。儘管人們瞭解各種想定的能力有限，美國仍想方設法嚇阻這些情況發生。

當前安全環境極度複雜。此種複雜不僅來自於美國、盟國及夥伴國所面對的各式各樣威脅，同時也肇因於潛在對手數量——換言之，這些對手就是所謂戰略競爭者。雪上加霜的是，這些戰略競爭者正在齊心協力推翻與取代以自由主義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或者簡單的說，這些對手想要降低或消滅美國對其周邊國家的影響力。簡言之，目前身處一個競爭激烈且複雜的安全環境。

競爭激烈的環境：美國與戰略競爭者的關係日益緊張。就個別國家而言，中共、俄羅斯及北韓都得以對美國、盟國及夥伴國發動戰略攻擊。伊朗由於具備區域飛彈打擊戰力，因此也可列屬戰略行為者。「那又如何？」的問題在人們拼湊蛛絲馬跡的過程中出現——所有戰略競爭身處危機與武裝衝突的可能性正在提高。同時嚇阻上述所有行為者原已十分困難，而此種挑戰還會變得更加複雜。

複雜化的環境：美國無法再試圖將潛在對手視為個別威脅，各個擊破、單獨應對。隨著中共、俄羅斯、北韓、甚至伊朗擴大合作，這些國家變得更加團結，至少在性質相近的安全目標上是如此。美國遍布全球的敵對國家正蠢蠢欲動，未來將不斷挑戰以自由主義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未來的威脅環境是多個戰略競爭者協調合作、集體行動，比多個戰略行為者單打獨鬥更為複雜。進一步深究這個問題可看出，一旦多個危機或衝突同時發生，將不會是個別獨立事件。最起碼，美國針對一個對手所採取的行動與傳達的訊息，也會被其他對手審視與解讀，即便如此，仍不足以說明此種安全環境的複雜本質。不論是否經過事先協調，這些危機與衝突臨機升高情勢的風險都不斷增加。換個說法，某個潛在對手決定是否升高情勢時，很可能因為存在其他理念相同行為者，變得更加膽大妄為、試圖挑戰現況。

假如今日安全環境的各種挑戰，根本就比過往更加複雜，那對於嚇阻行為有何影響？哪些嚇阻理論與具體做法仍然適用？哪些必須與時俱進？本文希望釐清嚇阻理論中，哪些仍具有參考價值？哪些應用方式必須適切調整？為達此目的，本文提出全新戰略嚇阻架構，目的在於提倡發展全般性、多行為者戰略嚇阻概念，以因應今日安全環境。

嚇阻基本要件：恆久不變的真理

構思未來嚇阻戰略必須審視目前仍適用的基本嚇阻原則。這些原則包含自核武問世以來就確立的嚇阻理論基本要件、嚇阻在各種衝突中演變的特性，以指出嚇阻與威逼間之關係，以及嚇阻與其他國家安全戰略(如競爭與作戰)之交互影響——相輔相成或彼此對立。某些真理雖然恆久不變，但在過去數十年間仍有所調整或簡化，美國卻未認真思考這些問題。因此，以下段落不僅重述某些真理，同時也強調在美國單極時代逐漸式微或遭否定的某些細微之處。

嚇阻理論基本要件：嚇阻泛指左右對手決策的刻意行為或某些舉動，藉此讓對手有所節制、不敢輕啟戰端。影響行為鎖定決策四個要素：分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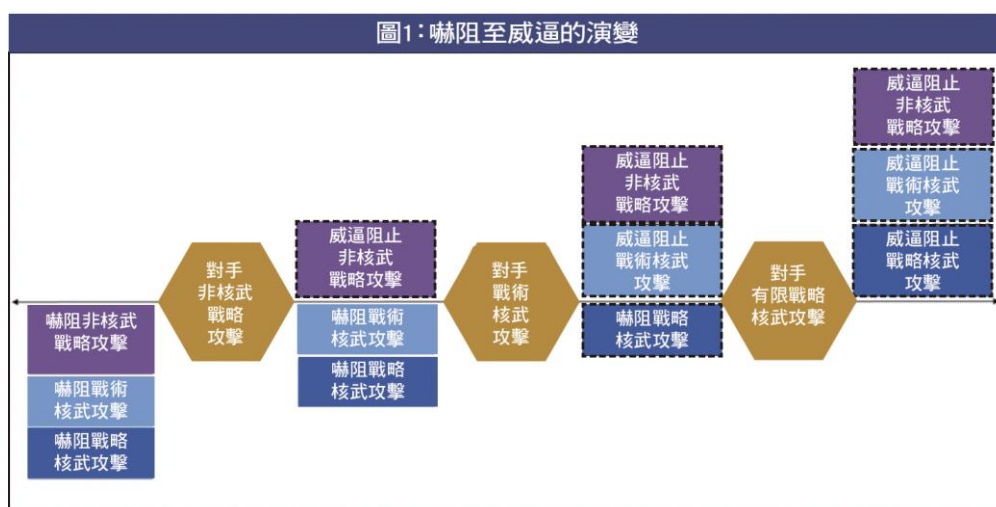
為行動成本、克制成本、行動利益及克制利益。這些成本與利益都是取決於決策者的主觀認知。此種推理若然成立，有效嚇阻端賴認明與精確評估某個行為者的戰略文化與關鍵利益所涉面向，因為這些都會影響對手價值判斷、風險承受能力，以及各式各樣形塑對手決策過程的其他因素。各種嚇阻戰略的共通性缺陷是人們習於以自身價值與思考方式套用在目標對象，導致無效的嚇阻行動或被潛在對手視為非理性的錯誤判斷。

嚇阻戰略如果侷限於強加對手行動成本(影響對手對行動成本的認知)與試圖斷絕利益(影響對手對行動利益的認知)，可能也不足以有效左右對手的某項決策，尤其當情事攸關國家安全時更是如此。在此種想定中，潛在對手認定之不行動成本(毫無行動的後果)就會成為嚇阻失敗的主因。假如某個決策者認定不行動的成本難以接受，就非常可能更加躁進、決定放手一搏，來承擔對手嚇阻威脅的任何成本。簡言之，若不行動必然帶來嚴重後果，那麼對手寧可採取行動，面對混沌未知的行動成本。

各種衝突的嚇阻：第二個基本原則是多重嚇阻目標同時存在，亦會隨當下侵略層級改變優序與本質。嚇阻目標可能同時包含嚇阻侵略、嚇阻武裝衝突、嚇阻局部使用戰術核武、嚇阻非核武戰略攻擊，以及嚇阻大規模使用核武。在承平時期，上述目標並存，但以更高層次情勢升級為重點的目標並非如此迫切，因為失敗風險相當低。因此，雖然嚇阻戰略攻擊一直都是美國的目標，但此種攻擊在平時發生機率幾近於零，故各種活動與訊息傳達主要都聚焦嚇阻可能導致危機的侵略行為。依此原則推論可得，嚇阻不會同時功虧一簣，而會分階段逐次失敗。

嚇阻目標的本質也會不斷演變。一旦某個嚇阻目標未能達成，人們會設法補救。假如無法嚇阻武裝衝突，人們會採取行動、動用資源，換個說

法就是威逼緩和情勢，並在最終達到終止衝突之目標。因此，嚇阻一旦失敗，嚇阻目標的本質就會轉變成威逼目標(如圖 1)。此種演變亦適用於嚇阻戰略攻擊。一旦對手發動戰略攻擊，不論是否使用核武，美國不僅會採取最嚴厲手段還以顏色，也會設法重拾戰略攻擊嚇阻行動。嚇阻目標的演變進程可能並非全然線性——情勢升高的發展方式並沒有任何物理定律可依循，稍後會進一步討論。



嚇阻與威逼是一體兩面。兩者都是藉由威脅與承諾，勸阻對手不要採取某種行動或停止侵略。² 作者稱此為以嚇阻為基礎的影響行為 (Deterrence-Based Influence, DBI)，此一名詞在後文中將與嚇阻一詞交互使用。相較於嚇阻的做法是環繞著「如果你不做，我也不會做」(與成本及利益限制有關，以承諾為基礎的訊息)、「如果你做，我就做」(與成本及利益行動有關，以威脅為基礎的訊息)，威逼則是置重點於「如果你不停止，我也不會停止」(與行動成本及利益有關，以威脅為基礎的訊息與行動)、「如果你停止，我就停止」(與成本及利益限制有關，以承諾為基

礎的訊息與行動)。採取影響行動的一方所採取的威脅與承諾必須具有可信度。

嚇阻—競爭—作戰：從美國的觀點，最後一項恆久不變的原則是，嚇阻不同於競爭或作戰，甚或作戰整備。以嚇阻為基礎的影響行為取決於對手的觀點。競爭與作戰聚焦單方面專業性、戰力及能力。競爭與作戰的勝算雖然通常依據潛在對手專業性、戰力及能力進行比較分析，但最終仍取決於某一方的自身觀點、國家目標、戰略、政策及作戰方式。這亦是一味埋首戰備整備並非完善嚇阻戰略的原因。如此一來，其實僅考量自身戰備整備，以透過威脅來強加對手成本或使對手無法得利，僅涵蓋潛在對手的半數決策考量因素。

競爭活動與戰備整備通常藉由影響對手所認定的行動成本與所獲利益來強化嚇阻行動。然而，這些舉措也會衝擊對手所認定克制的成本與利益，進而削弱嚇阻行動。競爭活動可能喪失合作的機會，因而讓克制的潛在利益消失。競爭可能破壞潛在對手的重大國家利益與安全條件，因而導致對手在克制期間付出更高成本。同時，戰備整備行動可能加劇對手錯誤認知的風險，這似乎就是關上機會之窗，或被解讀為攻勢洶湧而非防衛固守。

在不受限制的情況下，競爭與戰備整備可能削弱嚇阻效果。因此，安全戰略必須適切調合嚇阻、競爭及作戰，確保三者保持良性互動。如下一段所論，此種互動造成平時以嚇阻為基礎的影響行為遇上難題。



2022 年 10 月 25 日，美國俄亥俄級彈道飛彈潛艦西維吉尼亞號(USS West Virginia)於定期巡邏期間靠泊英屬印度洋領地狄耶戈加西亞島美國海軍狄耶戈加西亞島支援基地(US Navy Support Facility Diego Garcia)，進行港口訪問。

(Source: USN/Jan David De Luna Mercado)

全新戰略嚇阻架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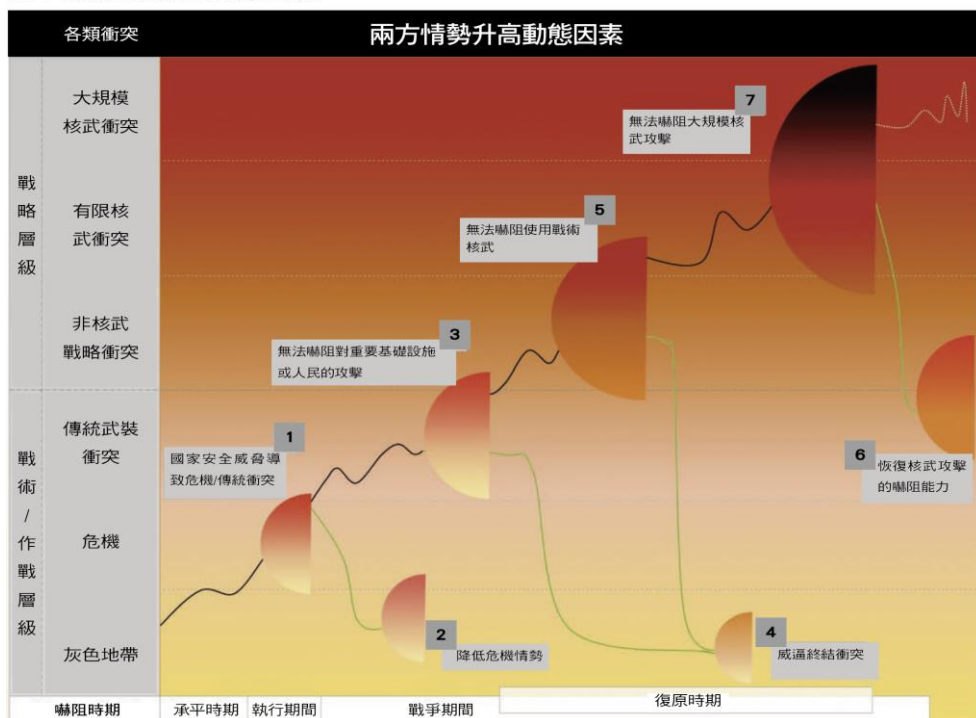
現代化戰略嚇阻架構是分析與研究日新月異的安全環境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工具，而當前戰略競爭對手日益同仇敵愾、擁有愈來愈多升高情勢選項。提出全新架構之目的是要讓國家安全團隊能獲得全新方法，思考戰略嚇阻行動，最終發展出現代以嚇阻為基礎的影響行為概念與戰略，俾肆應當前複雜、競爭激烈及複合式的安全環境。

情勢升高動態因素：發展有效嚇阻戰略前，必須先行瞭解情勢升高動態因素的本質。在思考與某個戰略對手發生潛在衝突時，情勢升高動態因素最好是以混沌理論進行界定，因為混沌網路(非常遺憾地)的某些特質非常適用此項研究。

首先，混沌網路是指一個系統的未來狀態無法預測。以嚇阻為基礎的影響行為取決於能否瞭解對手主觀認知，原本就屬高度不確定性挑戰。此種挑戰在危機或衝突發生時，設法瞭解、影響對手後續認知更是難上加難，因為此時壓力增加，且須面對無法知悉對手戰略或意圖的現實條件。

不確定性是與戰略競爭對手發生潛在危機或衝突時的必然情況，並非是反恐戰爭與美國過去數十年遭遇其他衝突的主要原因。事實上，這些戰爭具有自身複雜性與挑戰，但不會讓情勢升高至戰略層級。過往每個對手都受限於自身能力與戰力，且都不及美國、盟國及夥伴國。結果就是美國澈底主宰戰場，毋須顧慮戰略情勢升高問題。但美國與戰略對手陷入衝突時，情況就會完全不同，衝突期間充滿高度不確定性，且會隨侵略層級而與日俱增。不確定性在圖 2 中以半圓形表示，不同轉折點顯示對手可以自行選擇升高情勢的時間與地點(亦即點 1、3、5、7)。點 2、4、6 與其相連的綠色下斜線，則顯示美國降低情勢的行動，或威逼結束不同程度侵略行為的舉措。

圖2：兩方情勢升高動態因素



省思不確定的概念在戰略嚇阻的舞臺上有多大影響十分重要。兩大核武對手爆發全面武裝衝突是史無前例。此種衝突如何進行、核武是否會導致情勢失控或雙方極度的克制，目前都純屬臆測。因此，嚇阻戰略必須保持彈性，配合突發狀況靈活調整。諸如「情勢升高管理」或「情勢升高管控」等概念在此種背景下已經不合時宜。相較之下，「情勢升高運作」等全新概念反倒是面對不可控制因素的必要條件。非核武創新與對太空與網路的日漸依賴，進一步加劇了各種潛在不確定性。換言之，非核武戰略攻擊形式與其對人民與國家決策高層可能造成的衝擊都不得而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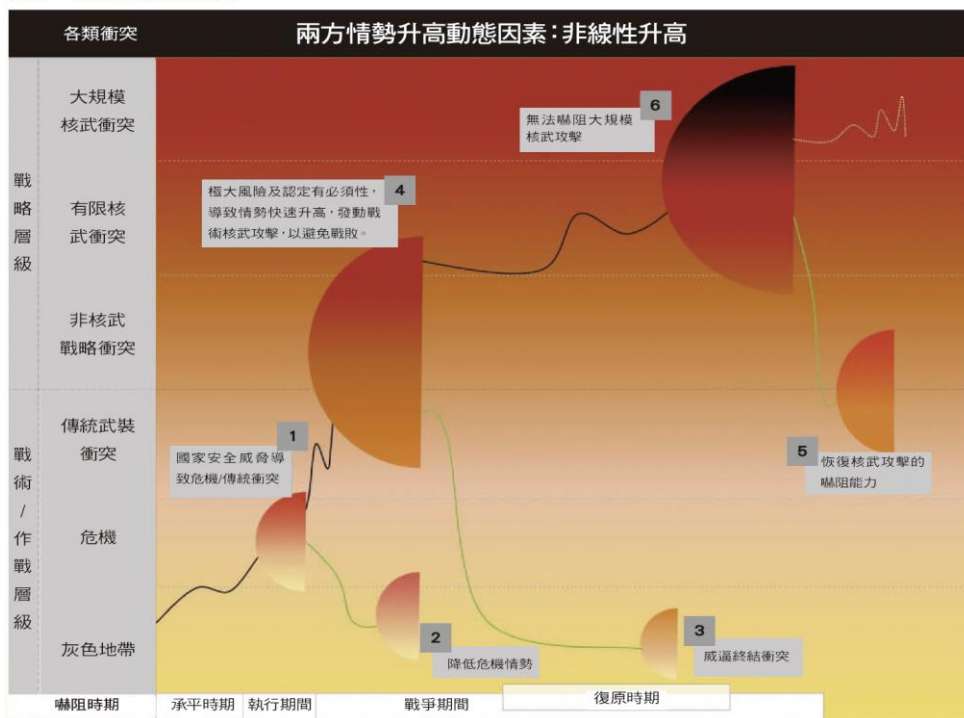
混沌架構的第二個特質是對初期條件相當敏感。簡言之，系統輸入條件的些微改變，都會造成極為不同的未來情況。將此種特質應用於情勢升高動態因素，可以顯露整個衝突期間發生的狀況環環相扣。當前與過去的活動都會影響未來情勢走向或者導致情勢升高。因此，戰略家們必須

思考立即接受風險與稍後接受風險的權衡因素。在某些情況下，可能必須先行採取挑釁行動，因為相對於衝突期間擦槍走火，在危機時升高情勢的風險相對較低。此種情況稱為**前置鏈結(Forward Connectivity)**，但也存在**後置鏈結(Backward Connectivity)**。**後置鏈結**係指未來可能發生情況對於當前活動所造成的影響。這並不是一個新概念。例如，冷戰期間，就稱之為**核武陰影**：亦即一個國家升高情勢至侵略的最高層級，以在未達前述極端門檻前，促成與克制自身行為的能力。因此，戰略嚇阻之所以令人憂心，不僅因為具有戰略攻擊的可能性，同時也因為一開始就可能發生危機或衝突，甚至也涵蓋灰色地帶競爭導致危機的本質。不僅如此，嚇阻戰略必須關注衝突方式，因為行為者達成戰術與作戰層級目標的方式，會影響對手決定是否要將情勢升高至戰略層次。

美國與某個戰略對手間之情勢升高動態因素存在混沌本質，因此情勢可能非線性陡升，而非圖 1 與圖 2 所顯示之階梯(或爬梯)式漸進升溫。侵略行為中極端情勢躍升的可能性，取決於對手風險承擔傾向、作戰戰略與核武所扮演的戰略角色、兵力組成、兵力態勢、主觀認定的戰敗與戰勝情境，以及對手對於美國意志與決心的詮釋。這些因素都左右著非線性情勢陡升的可能性(圖 3)。在此，對手認定情勢快速升高至使用戰術核武，是獲得作戰優勢的必要條件，同時避免因備而不用遭致挫敗(點 3)。

對手採取極端手段升高情勢的行動，是美國兵棋推演、計畫及戰略中極常遭到忽略的場景。針對與戰略競爭對手爆發危機或衝突的情況，試圖在戰術與作戰層級全面制壓與擊敗對手，卻完全不考慮戰略層級問題的傳統作戰戰略是極度危險的。如下一段探討內容，挑戰勢必遍布戰術、作戰及戰略層級。

圖3：情勢非線性升高



以嚇阻為基礎的影響行為時期：瞭解情勢升高動態因素可以讓人深入剖析不同侵略層級間之互動情況。如前所述，重要轉折點顯示領導人有意決定升高侵略行動層級。³ 這些情勢升高點會產生明確的以嚇阻為基礎的影響行為時期：包含承平時期的執行期間、戰爭期間及復甦時期(見圖2、圖3最下方列)。

每一個以嚇阻為基礎的影響行為時期，都會律定不同目標之優先順序並列舉當下挑戰。因此，各時期都必須前後關聯，訂定專屬做法。承平時期的主要目標是嚇阻侵略與可能導致危機的顛覆性行為。此一時期的挑戰是堅持與信守嚇阻目標，同時抗衡潛在對手。競爭戰略會設法爭取己方相對優勢。此種優勢包含外交關係與協定、地區使用權與領土主張、軍事戰力與能力、全球經濟影響力，以及科學與科技進展。在大國競爭中，最關鍵之終極議題是國際秩序。這些競爭目標全部都會遭遇升高競

爭對手克制所付成本的風險。因此，承平時期的戰略必須管理競爭與嚇阻之間的緊張關係。

執行期間的優先目標，是透過嚇阻避免危機升高為全面武裝衝突。陷入危機時，當下挑戰在於如何在展現果斷態度與引發不必要或不樂見情勢升高風險間取得平衡。一方面，對手意圖的不確定性，可能造成我方猶豫不決或反應強度不足，以致無法有效展現關切與決心，導致對手誤認自己掌握有力或優勢地位，進而升高情勢(例如，對手認定有機會造成既成事實)。另一方面，對手意圖的不確定性，也會造成我方過度躁進，迫使對手將升高情勢至不必要的衝突，或許，競爭對手本抱持補救或保護國家利益的心態，毋須發動全面衝突即可達成前述目標。

另一個重要考量因素，是參透對手是否決定發動衝突。假如對手仍猶豫不決，則主要目標仍是嚇阻武裝衝突。但若是對手心意已決，只是還未全面發動攻擊，則主要目標應調整為威逼，或說服對手改變升高情勢的念頭。瞭解要採取哪種手段——嚇阻或威逼行動——是成功影響對手的關鍵。嚇阻一般都較為被動，威逼行動反可掌握主動權。嚇阻行動大體上側重傳達訊息，威逼行動則要採取預劃的威脅手段。



2020 年 9 月 22 日，美空軍第 341 飛彈保修中隊技術人員李根(Jackson Ligon)上兵與馬利那西奧(Jonathan Marinaccio)下士於蒙大拿州大瀑布(Great Falls, Montana)附近發射場進行模擬電子發射義勇兵飛彈(Minuteman)測試期間，將重返大氣系統結合至洲際彈道飛彈墊片上。

(Source: USAF/Daniel Brosam)

戰爭期間，以嚇阻為基礎的影響行為的主要目標為嚇阻戰略攻擊。依據不同對手，此舉可能為核武、非核武或兩者兼施。因此，戰爭期間的挑戰是在戰術/作戰層級與戰略層級一箭雙鵰。戰術/作戰層級置重點於地面、水面、水下、空中、太空及網路空間的戰場優勢。不論哪個領域，戰術/作戰層級的主要任務為調整兵力與戰力整合，以取得軍事勝利。藉由此種方式，迫使對手領導階層降低情勢，但須以傳統手段達成目的(換言之，戰略層級影響行動仰賴戰術/作戰層級勝利)。

戰略層級的重點在於不考慮兵力調整的條件下影響對手領導階層。雖然可能涉及戰術/作戰層級相仿的軍事領域，但旨在直接影響對手的關鍵決策者。此外，千方百計運用外交、資訊、經濟及其他工具來說服對手領

導階層，自我克制不讓情勢升高，抑或扭轉原定升高情勢舉措。如何以作戰層面擊敗對手，但又要確保對手不要因前述挫敗而升高情勢，是戰爭期間的棘手問題，令人舉步維艱。

最後，復原時期包含兩大重要以嚇阻為基礎的影響行為目標。第一是威逼結束當前有限度戰略攻擊，第二則是嚇阻大規模、威脅存亡的戰略攻擊。此一期間的挑戰是在不造成情勢進一步升高的條件下，修正原先戰略嚇阻行動的失敗。

假如各項針對對手戰略攻擊的行動效力不足(如未澈底執行)或放錯重點(錯誤認知)，嚇阻規劃人員如何修正現行做法呢？修正循環可能以下列方式進行：假如某個對手在下決心前已先行考量行動後果，且這些後果屬於可接受範圍，則恢復戰略嚇阻需要一種「修正」那些特定認知的處置手段。然而，審視此種環境不斷增加的不確定性：判斷那些認知是什麼，以及那些認知的當前狀態，是件極度困難的工作。換個角度說，假如對手必須採取戰略升高情勢作為(亦即克制所造成的後果無法接受)，則問題就是要如何(包含自我克制)想方設法緩解那些壓力？最差情況是所採取的處置方式，無意間造成不行動的後果更為嚴重，甚至惡化成大規模生死存亡的情勢。



2023 年 3 月 12 日轟炸機特遣部隊任務期間，美空軍第 23 轟炸機中隊 B-52H 型同溫層堡壘轟炸機於中央司令部責任區上空，準備接受第 91 遠征空中加油中隊 KC-135 同溫層加油機空中加油作業。

(Source: USAF/Diana M. Cossaboom)

戰間期動態因素：兩方情勢升高動態因素與以嚇阻為基礎的影響行為各時期已經夠複雜了，但若考量多個危機或衝突同時發生的可能性，複雜性將會更高。此時存在多個優先以嚇阻為基礎的影響行為目標，而某個以嚇阻為基礎的影響行為時期之挑戰將會因其他時期的挑戰而更加複雜。除此之外，某個衝突的情勢升高動態因素可能會與另一個時期的動態因素相互糾葛。對手所認定的升高情勢必要性或機會，可能受到另一場衝突事件的影響。

全新戰略嚇阻架構除了必須針對特定對象量身打造，也要考量特定以嚇阻為基礎的影響行為時期之動態因素。總體而言，承平時期的嚇阻為基礎的影響行為作法不適用執行期間、戰爭期間或復原時期。衝突進行過程中，更無法維持衝突前所採取的嚇阻活動。針對每個以嚇阻為基礎的

影響行為時期所遇挑戰採取的做法必須因時制宜，而同樣道理也適用單一或多重危機(衝突)情況。假如發生多重危機或衝突，執行做法就必須考量全般狀況。在此種條件下，美國必須同時追求多重目標、應對不同對手，並考量目標優序調整與以嚇阻為基礎的影響行為時期轉變等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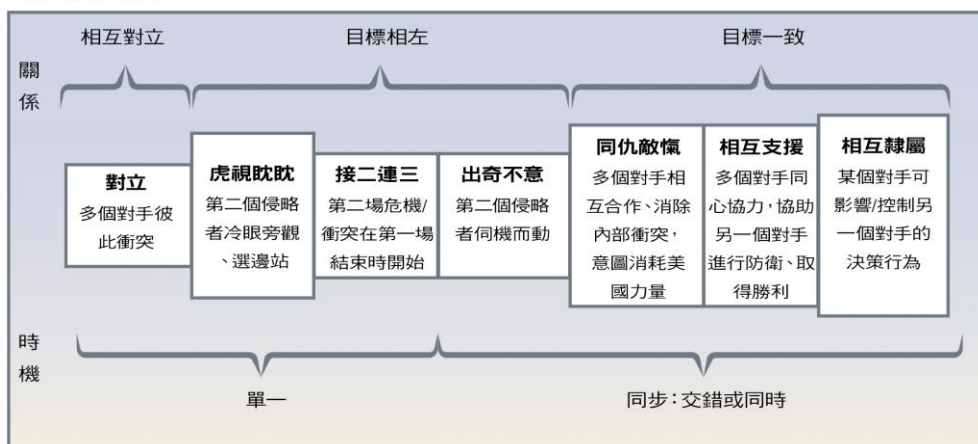
掌握在不同想定狀況下如何嚇阻多個戰略對手，更是突顯戰間期動態因素的重要性。戰間期嚇阻手段包含陷入某個危機或衝突時，嚇阻第二、第三或全新危機或衝突的戰略。其亦包含針對多個進行中的衝突，採取嚇阻或威逼終結同時性、重複性或臨機性情勢升高的行動。

複雜性隨著戰略對手數量增加、對手協調程度深化，以及其升高情勢選項而提高。在危機或衝突發生時，有關美國必須思考與設法影響的潛在情勢升高路徑上，複雜性會更高。同時，亦提高複合式情勢升高動態因素的風險。面對多個戰略對手時，複合式情勢升高動態因素會比面對單一競爭對手誘發更嚴重的侵略行為。

複合式情勢升高動態因素出現的範圍，很可能取決於戰略對手彼此關係的本質。圖 4 為這些潛在關係的範圍及同時爆發多個危機與衝突的可能時機。大體而言，複合式情勢升高動態因素的風險，會隨著對手間從意見相左到同仇敵愾而持續提高。

此外，歷史證據顯示這些關係都會變動，複雜性因而增加。競爭者彼此間的關係，很可能會隨侵略進程演變。某些一開始不一致、不協調的危機，可能會發展成一致而協調(甚或結盟)的同步衝突。即便沒有爆發多重危機或衝突，針對某個對手所採取行動必然會有其他對手虎視眈眈，因而必須處理的對象可能會變多。因此，戰略嚇阻架構必須考量所有戰略對手，並涵蓋不同層次的衝突。

圖4：各種關係



現代以嚇阻為基礎的影響行為公式

在多邊競爭環境中，美國必須在不同侵略層次同步追求多個以嚇阻為基礎的影響行為目標，傳統的「嚇阻 x 行為者在 z 狀況中不採取 y 行為」的嚇阻公式已然過時。⁴ 相對地，美國需要一套考量多個潛在或進行中危機或衝突的全新公式。一個現代以嚇阻為基礎的影響行為公式應遵循：

在 z_k 情況下，與影響行為者 x_i 有關的行為 y_j ：

- x_i 包含所有潛在戰略對手
- y_j 包含針對每個潛在對手的所有以嚇阻為基礎的影響行為目標
- z_k 提供與各個潛在對手相關侵略層次的背景條件

現代化的嚇阻架構必須同時考量多個潛在對手與多重嚇阻導向影響行動目標。一般針對特定行為者在特定狀態下所設計或執行的行動，現在必須因應多個對手同時出現而適時調整。此舉所衍生的想定狀況，會因為顧及後續針對多行為者的更廣泛影響力，因而導致無法有效對抗主要對

手的風險。或者，這可能導致需要比平常情況更高層級的侵略行動，但可適用於影響第二個對手或多個對手。過往，量身打造的嚇阻戰略只針對單一對手，現代以嚇阻為基礎的影響行為架構必須具備彈性與創意，以同步應對多個對手。



2022 年 12 月 2 日，B-21 突擊者轟炸機在加州棕櫚谷(Pammdale)公開亮相。

(Source: USAF)

結語：必要的轉變

今日安全環境存在的各種獨特挑戰需要一套整體嚇阻作為，統合運用所有國力要件(加上美國盟國與夥伴國國力要件)，以嚇阻各類衝突，發揮整體嚇阻效果。此種整體性做法是在各種不同條件下，影響多重潛在對手決策考量因素四大環節的關鍵要素。

從單一焦點轉換至多重行為者掌握，是必須克服的最大障礙。轉變需要學識上的鑽研與創意。追根究柢，就是克制簡化問題的衝動。人們太常將戰略發展侷限於慣常行為方式以符合資源條件限制。然而，今日的戰略家們必須瞭解威脅的真實情況，並誠實面對複雜、競爭激烈且複合式

的現實安全環境。

所幸，目前已有某些最佳做法可供參考。首先，以最差狀況當作計畫行動的想定。具體而言，勿再侷限分析內容於對手的夥伴關係與聯盟關係、此種關係的規模與範圍，以及這些關係出現的時機。直接審視歷史上的戰爭可以發現，夥伴與聯盟關係會隨個別行為者的安全需求而有所起伏。「他們絕不會」的說法不應掛在現代戰略家嘴邊。

第二，分析潛在對手間之互動。瞭解對手意謂考量各種潛在危機或衝突期間，情勢升高的發展脈絡。在大國競爭時代，多重戰略對手的關鍵國家利益會趨於一致，美國應結合各種線索，瞭解整個威脅樣貌，才是明智的做法。

最後，提高對潛在對手戰略文化的瞭解。欲瞭解某個競爭對手，必須瞭解對方獨特歷史、價值及行為方式。此舉左右所有以嚇阻為基礎的影響行為時期戰略發展，對執行期間、復原時期及戰爭期間的影響尤為關鍵。

一個新的安全環境需要人們評估自身戰略嚇阻做法，以確認哪些真理恆久不變、哪些假定事項不符時需、哪些架構必須改頭換面。對於前一個威脅環境完全適用的行動，在今日已不足肆應情勢。

作者簡介

Kayse Jansen 現任美國戰略司令部計畫政策處資深技術顧問。

Reprint from *Joint Force Quarterly* with permission.

註釋

1. 2022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22),

<https://media.defense.gov/2022/Oct/27/2003103845/-1/-1/1/2022-NATIONAL-DEFENSE-STRATEGY-NPR-MDR.PDF>.

2. 另一種形式的威逼(本中未提及)，可強迫另一方為其所不欲為。
3. 雖然意外事件或未經授權行動也可能導致情勢升高，但此類情況並不在本文探討範圍，因為其結果是非蓄意或至少非領導人的意圖所造成，領導人的決策考量因素才是戰嚇阻架構的目標。儘管如此，這些非蓄意或未授權情勢升高途徑也屬周延安全戰略必須思考與設法消弭的問題。
4. *Deterrence Operations Joint Operating Concept, Version 2.0*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December 2006), 52,
https://www.jcs.mil/Portals/36/Documents/Doctrine/concepts/joc_deterrence.pdf?ver=2017-12-28-162015-337.